

陵川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山西省陵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陵川文史资料

第 四 辑

政协陵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陵川文史资料》第四辑编委会

顾 问:王云鹏

主 任:赵保胜

副 主 任:程昌顺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学文 李景勤 李廉芳

张春江 张国信 苏金松

赵根昌 赵喜胜 姚惠安

都慧明 秦喜根 程爱鸿

责任编辑:赵根昌 都慧明

前 言

赵 保 胜

在新千年即将来临之际,《陵川文史资料》第四辑以崭新的面貌正式出版问世了。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陵川政协从成立之日起,特别是第五届委员会以来,一以贯之地以存真求实为原则,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为宗旨,不断加大文史资料工作的力度,先后调整充实了文史资料工作机构,改善了工作环境,使我县的文史资料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三年来,我们不仅搜集出版了带有文史性质的近三十万字的三期《古陵揽胜》期刊,而且还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大力搜集、整理我县建国前后有史料价值的文史资料。《陵川文史资料》第四辑从征集稿件到出版发行,仅一年时间,其成书时间之短,质量之高,字数之多,内容之广是历届政协无可比拟的。为此,我代表政协陵川县第五届委员会向参与本书撰稿、编审、出版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并对他们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表示诚挚的谢意!

《陵川文史资料》第四辑共设有七个栏目:“史海探秘”栏,详细记述了军统局直属晋东南站和国民党二十七军统治陵川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烽火岁月”栏,着重记述了日寇侵占陵川及国民党统治陵川时期践踏、残害生灵的滔天罪行和陵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对敌斗争经历;“创业追忆”栏,从不同角度以纪实的手法认真记述了建国以来陵川各个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的经历。不仅再现了当时的辉煌成就,而且认真总结了值得记取的经验和教训;“风情民俗”栏,从不同侧面记述了陵川方言及民风民俗的形成及演变过程;“戏曲漫笔”栏,着重记述了上党梆子剧种和平腔秧歌从雏型到成熟以至流行的经历;“人物春秋”栏,以传记的方式介绍了七位陵川知名人士不同的成长史,不同的生活史和不同的人生轨迹;“修志记事”栏,较详细记述了十修《陵川县志》所走过的艰难、曲折、非凡的路程。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陵川文史资料》第四辑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作用将得到充分体现。

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政治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陵川文史资料》第四辑经过努力尽管正式出版了,但由于时间仓促、资料不足、人员水平有限等方面的原因,错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日

目 录

前言·····	赵保胜(1)
---------	--------

史 海 探 秘

军统局直属晋东南站揭秘·····	王云鹏(1)
二十七军统治时期史料一束·····	王云鹏(10)

烽 火 岁 月

我在陵川牺盟会工作的片断回忆·····	卫逢祺(20)
太南游击队在陵川和豫北一带 活动简况·····	傅大章 宋殿宾 黄 维(27)
忆太南游击支队在庙洼村的斗争·····	宁田锁(33)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陵川的初期活动·····	路宪文(39)
陵川县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拾零·····	陈冰之(62)
抗日战争中的陵川牺盟会·····	李茂才(65)
回忆陵川抗日游击支队建立前后·····	陈冰之(71)
“反师斗争”前哨拾零·····	李中顺(74)
“反师”记事·····	路宪文(87)
南马事件发生前后·····	周 刚(92)
陵川县抗日人民武装情报工作简况·····	徐仙洲(95)
忆九峰山歼灭战·····	王中儒(97)
三次到陵川的回忆·····	武人文(101)
抗日战争时期陵川县妇救会组织活动情况·····	黄书萍(106)

十二月事变前后我在陵川工作的片断回忆·····	董迈林(109)
开辟陵东地区抗日工作的回忆·····	王葆珍(114)
西沟土匪覆灭记·····	王成骏(125)
关于“太行八中”及其前身的一些回忆·····	张寅生(132)
“太行第八中学”纪念碑琐记·····	秦鸿昌(136)
关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姬镇魁斗争的一些情况·····	路宪文(138)
县立冶头民革两级小学的回憶·····	王云鹏(142)
十二月事变在陵川·····	王云鹏(145)
十二月事变在天池·····	郎锁全 李廉芳(152)
回忆争夺附城的几次激烈战斗·····	路宪文(156)
日伪盘踞县城二年纪实·····	王云鹏(160)
万章惨案·····	路宪文(177)
东掌惨案专访记·····	苏金松 秦保金(179)
光辉的战斗史诗	

——围城战役和陵川独立营简介·····	李中顺(185)
---------------------	----------

创 业 追 忆

陵川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回忆·····	王学文 宋元兴 秦喜根(195)
附城村农业合作化劳动管理及 收益分配纪实·····	张国信 路新保(206)
陵川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 ——忆复庄红旗光明社·····	李景勤(211)
陵川农业五十年综述·····	李景勤(215)
陵川林业工作片断回忆·····	杨珠保 李廉芳(222)
陵川科技事业发展的回顾·····	赵永兴(234)
城市知青在陵川·····	姚惠安(241)
“非常时期”片断经历·····	姚惠安(248)
长征水池工程纪实·····	张春江(253)

陵川农业中学的兴与衰····· 董小苏 姚先翠(263)

风 情 民 俗

关于西溪、龙王头的风景及祭神活动····· 李希泌(267)

浅谈陵川方言中的“不”····· 刘学文(273)

关岳庙石狮之追忆····· 温 鹏(286)

戏 曲 漫 笔

关于上党梆子的记述····· 李希泌(289)

平腔秧歌····· 赵喜胜(304)

阮章竞与陵川····· 程爱鸿(309)

人 物 春 秋

人民公仆卫 恒····· 赵垒全(311)

丹心为民李希泌····· 王长发(317)

须生泰斗赵清海····· 栗守田(321)

教坛巾帼徐月华····· 靳虎松(325)

宝刀不老赵贵保····· 王长发(329)

长空雄鹰张保旺····· 张发庆(334)

国军中将领段树华····· 靳虎松(341)

修 志 记 事

十修《陵川县志》纪实····· 王云鹏(344)

军统局直属晋东南站揭秘

王 云 鹏

引 言

军统局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是一个专门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特务组织。十二月事变后，随着国民党中央军盘踞陵川，军统局便在陵川成立了直属晋东南站。由于其活动十分秘密，所以社会上一般无人知晓。我从五十年代末编写十修《陵川县志》开始，就十分留心想把这个特务组织的内幕揭开，但十余年来始终无从着手。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再搞史志工作的需要，我阅读了沈醉先生编写的《军统内幕》后受到了一点启示，就带着问题对当时曾驻该站工作的阎发如、王明江等人，多次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当面调查和信件访问，又查阅了一些有关的档案资料，才对军统局直属晋东南站的基本状况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考虑到这个特务组织的活动已过去了半个世纪，而《军统内幕》一书又对它一笔未提，深恐这方面的史料会有湮没之虞。因此，特根据调查所知，整理成文，揭露于世。

一、军统局直属晋东南站概述

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暴风骤雨结束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又酝酿和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配合这次反共高潮，军统局特于

1940年12月,在国民党嫡系二十七军所占领的陵川,成立了直属晋东南站(以下简称军统晋东南站)。站部设在城东十里一个不满五十户的神南底村,站长由老牌军统特务、山西军统创始人之一的乔家才担任(交城人),他的公开掩护身份是二十七军少将高参兼该军参谋处副处长。

军统晋东南站担负的任务,主要是搜集共产党领导下晋冀鲁豫边区及其所属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四个区党、政、军、经、文等方面的情报,其次是搜集周围日伪军活动的情报,并控制杂牌军队的动态。按照军统局规划,该站的活动范围,原则上包括正太路以南、白晋路以东、平汉路以西、黄河以北等广大地区。当时军统局在林县林淇镇设有以文强为处长的华北办事处,在四十军和新五军内也各驻有军统局的随军组。军统晋东南站同以上三个特务单位的电台不断密取联系和互通情报。他们将收集到我方的各种情报提供给国民党驻军,作为对付我方的策略资料。

自军统晋东南站进驻陵川以后,十二月事变前,以李郁才为首驻在陵川城西街西杨宅院,不断同我牺盟会进行较量的国民党晋南工作团这个“中统”组织,被彻底排挤出陵川县境。当然,这属于国民党两个特务组织争权夺利的内部矛盾。

二、军统晋东南站组织沿革

军统晋东南站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颇具规模的特务组织。站部编制人员约达二十名左右,包括站长乔家才、副站长孔觉民、书记王明江,还有策反专员、电台台长、编审、译电员、电台交通员、收发员、交通员等;站部会计由乔家才直接兼任。同时在城内西街甲字10号(即“杨宅”)设有该站的对外联络处,常驻人员2名,负责人初为王叔刚,后为廉芳清。

这个站还设有相当于县团级以上职务的兼职通讯员。他们是

时任三青团长治分团主任的宋文霖(驻陵川城关)、和不久即任高平县长的姬镇魁、长治县长的聂士庆、晋城县长的张鸿惠,以及日伪长治师范校长的张公度。这些人都是站部直属的高级特务。

军统晋东南站下设三个情报组:沁阳情报组和邢台情报组,原属军统局河南站建制,为保证晋东南站初建时情报来源,于1940年12月临时划归军统晋东南站领导,在编人员不多,每组只有组长、通讯员、报务员五、六名。但还不到一年,至1941年下半年,这两个组仍归属于军统河南站领导。

长治情报组是该站领导下资格最老、编制最大的一个情报单位。它原属军统局西北区和改组后的晋陕区领导,比晋东南站成立时间还早三年多。该组于1939年长治沦陷后,即由长治城内先后转移至北天河村和西火镇,由于日军“扫荡”频繁,又转移至陵川县西关李宝芝院内,1941年3月,才划归军统晋东南站领导。开始驻在陵川东坪上村,继即移至站部驻地神南底村,但电台仍转移至长治天河村潜伏工作。该组原有正副组长、译电员、通讯员、交通员、报务员等20名左右;仅通讯员即有九名。其活动范围原包括晋城往北各县,自划归晋东南站后,人员配备逐渐减少,活动范围也随之缩小。

军统晋东南站于1941年3月成立了四个行动组。即长治行动组、高平行动组、晋城行动组、修武行动组。本拟建立新乡行动组,因中统和军统发生矛盾,故使这个组胎死于腹中,没有建成。据《军统内幕》说:“行动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是军统一切活动的总称,举凡逮捕、绑架、刑讯、解送、看守、暗杀、纵火、偷盗以及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都属于行动工作的范围。”由此推见,行动组是一个尤为恐怖的特务组织。

军统晋东南站于1941年在河南辉县境内建立了冀鲁豫行动队,由辉县县长戴日暄以县长的公开名义为掩护兼任队长。队员编制20名,每人每月由站部津贴法币20元,实际上他们都是由戴

日暄属下的士兵顶名,并无专职队员。因此他们多是采取集体行动,活动表现也不突出。

军统晋东南站在1941年,还建立了正太铁路破坏队,队长由时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四总队司令侯如墉兼任,还设有指导员和报务员等,队员20名,每人每月由站队津贴法币20元。实际上他们都是由日伪阳泉警备队和侯如墉部下的士兵顶名,活动次数很少。

军统晋东南站在二十七军中分布有专业军统人员。军统参谋处第二科科长和一名少校科员专任本职。该军所属四十五师、四十六师和预备第八师的参谋处第二科,也各设一名以科员为掩护身份的专职军统人员。这三个师的专职军统人员,军统局均给他们直接发有密码本,他们所搜集的情报交由站台转发或提供站台参考。每人每月军统局津贴法币20元,由晋东南站代为转发。

此外,乔家才野心勃勃,曾利用常克强之弟常克俭在太原市日伪医院供职的关系,交给常克强法币200元,让他到太原开办了一个“松花旅社”,准备掩护该站特工进入太原秘密活动,但其结果难予查清。

1943年1月,乔家才调职,继任站长王和众常驻洛阳,未到陵川,由副站长张秉玉(1942年冬到职)主持日常事务,其余人员也有变动,最明显的是站部增设了专职会计。社会上反映乔家才走时把大笔现金装入私人腰包,这同他直接兼任会计有关。

1943年5月,日军最后一次扫荡太南,驻陵的二十七军一败涂地,大部渡河南逃。军统晋东南站因失去靠山,其特工人员东奔西跑,有如丧家之犬,流窜于高平、晋城境内进行分散活动(主要活动于高平四明山等地)。同年七月,驻守陵川城内的日伪军近百名突然包围了神南底村,因特工人员已逃之夭夭,只有一名留守人员阎发如被俘投敌。1943年9月,军统局在洛阳设立了以乔家才为主任的华北办事处。从此晋东南站由原来军统局直属,划归华北办事处领导。冀鲁豫行动队和正太铁路破坏队,也成了这个办事

处的直属单位；高平、晋城、修武三个行动组宣布撤销，一律改为情报组（长治行动组于5月日军“扫荡”时已经投敌）。同年年底，站长和众调职，又提拔该站书记车祥生（1943年2月接王明江任书记）担任站长。同时，高平、晋城、修武情报组已编入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工作总队太行大队的四个分队。车祥生这个光杆站长，不得不到西安办理结束手续。至此，军统晋东南站结束了它仅有三年多历史的寿命。

三、军统晋东南站的基本活动

军统晋东南站管辖地域辽阔，活动相当秘密，这里仅能表明它所进行的几项基本活动：

第一是为二十七军提供情报。自晋东南站成立后，二十七军原有的谍报组织即行撤销，所需情报完全由该站为之供给，军部每年津贴补充费两千元。这同原来的谍报组织相比，效果既高又可节省开支一倍以上。晋东南站的主要侦察对象是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和所属各级党政机构，以及八路军正规军、地方部队和民兵的情况。实际上他们对我晋冀鲁豫边区及所属主要党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以及一些地方部队的大体情况，已基本上调查清楚，适应了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局部需要。对日伪方面，自建站以后，日军对太南的大规模“扫荡”共有四次，该站一般能在日军出发的前三天，探清敌人的“扫荡”地点和兵力部署等真实情况，提供给二十七军以便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在这点上它是利用军统分子裴西园打入日伪长治宪兵队当便衣侦察和张公度担任日伪长治师范校长的关系，作为情报的主要来源。该站有时还根据所得情报，立即指示长治、高平等行动组，配合国民党县政府警察力量，把敌人的电线割断，使之中断联系。当时驻陵的二十七军，对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大多采取的是逃跑战术，很少有

实际的抗日行动。该站为之供给的情报往往只能给二十七军的临阵脱逃造成方便条件。

第二是配合国民党党政机关实行“清乡”、“清党”。晋东南站成立以来,国民党曾开展过两次大规模的“清乡”、“清党”活动。第一次是1941年6月至年底。这次是由晋东南站背后策划,设计委员会公开领导,采取“清乡”和“清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主要清洗对象是十二月事变前参加八路军、牺盟会以及各界救亡团体的骨干成员和进步人士。其特点是村村建立“五户连环保”,推行一人亲共,四户同罪的连坐制度,被惨杀逮捕和处罚的群众约达数百余人。第二次是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这次是由二十七军特工统制处副处长唐炎峰直接指挥,晋东南站也积极配合和参与。其特点是分区负责清剿,各村密布岗哨,无区、村政府通行证者不准通行。对“嫌疑”小者押解到军部在宋家坡、冶南所设的集中营长期监禁;对“嫌疑”大者,送交特工处在北关所设的“政治犯拘留所”严刑逼供。仅1943年3月18日,即分别在城关、平城、附城,同时枪毙抗日干部、群众21人,其手段之毒辣令人发指!

第三是将军统骨干推向政界。乔家才利用他同范汉杰的关系,通过自己在军区设计委员会这个党政军联合机构担任委员之便,推荐晋东南站直属通讯员和高级特务去担任各县县长,即任命张鸿惠为晋城县长,姬镇魁为高平县长,聂士庆为长治县长,田峻为长子县长,李泉为屯留县长。这样,他们政权在握,便于以公开身份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因此,在这些县常使军统力量和国民党县政府的公安警察力量互相配合,共同打击我抗日政府的地方武装和民兵活动,当然也不断对日寇进行袭击。他们前后共抢夺我方和缴获日伪步枪30余支,受到了军统局的金额奖励。

第四是发展军统组织和培训骨干。军统晋东南站曾在国民党、三青团、党政机关和晋东南联中等单位,秘密接收了极少青年骨干分子为军统成员。由于该站及其下属组织的特工成员,基本

上都是临训班、黔训班、兰训班毕业,有个别还住过重庆爆破班。为提高该站所属特工的专业技能,曾把十名青年军统分子,推荐到兰(州)训班第四期去参加训练。同时,站部在神南底村,还举办过两期(每期半月)专业行动技术短期轮训班,抽调所有下属单位的特工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情报搜集法、擒拿术、化妆术、侦察术、枪支使用法、黄色炸药爆破法等。最后还举行各类手枪的实弹射击,并将梯恩梯绑在树上观察其爆破效果。

第五是秘密发展军统外围组织。它们发展外围组织的企图,主要是为了壮大自己的活动力量,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互相联系,暴露军统内部的真正秘密。它们在站部及周围各县发展了六个外围组织,外围组织的成员并非正式军统分子,而是该站的义务情报员。他们侦察到共产党方面的情报,都由其领导集中报站。外围组织的名称因地而异,站部总领导称“青年救国团”,陵川称“铁血救国团”、长治称“除奸救国团”、高平称“抗日除奸团”、晋城称“杀敌救国团”、修武称“忠义救国团”,除陵川团员有 20 余名外,其余各县都只 5 至 10 名。参加外围组织的仪式,在陵川境内的都在西街接头处举行,由乔家才或孔觉民亲自主持,团员要向蒋介石肖像鞠躬,并要举手宣誓和按指印;桌上左右各放手枪一支,表示要持枪执行任务,或在被捕与其它不利的情况下自杀殉职。

第六是通过培训税务人员大售其奸。二十七军统治时期,曾设立了一个管辖二十个县的党政军合一机关——军区设计委员会。乔家才以其兼任该会委员的身份,为解决该委员会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城关举办了一期有 30 余人参加、为期一个月的税务人员培训班。他曾利用这一机会,专派廉芳清到班内讲授以共产党为侦察对象情报搜集法,企图把税务人员培养成为晋东南站的义务情报员,训毕派往各个税卡完成上述任务。此后虽也有个别反映过一些普通情报,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第七是和军统局策反站互通声气。军统局于 1941 年,在河南

林县林淇镇,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策反共产党内部叛变的军统局直属华北策反站。其正副站长(都是我党叛徒)都同庞炳勋、孙殿英过从甚密。因此,该站也兼为四十军和新五军提供有关我党晋冀鲁豫边区及所属太行军区的军政情报。站长黄逸公当年夏天由重庆赴林县时,曾专经神南底同乔家才密取联系;副站长朱崇荣也于次年到达神南底同乔家才面谈达半月之久。该站的经费是由晋东南站特发的,他们所收集的情报,乘交通员来报销经费之际,交给晋东南站进行参考,同时双方还利用这一机会交换情报。

第八是晋东南站下属单位的主要活动。据已掌握的资料表明:他们既袭击共产党方面,也袭击日伪军方面。如长治行动组都是以长治警察局人员为公开身份进行特务活动的。他们曾用黄色炸药,先后三次在长治城北炸过日军“东路线”的轻便铁路三次,其中一次炸得车头出轨,伤亡较大;配合高平行动组割断日伪长治至高平电线丝共达三万多斤;配合国民党长治县警察局力量,先后夺取我方民兵和日伪警备队、县政府步枪30多支。高平行动组用德国造维火伞烧毁城关日伪仓库一座;配合长治行动组多次截断高平至长治的电话线,送交二十七军军部;配合姬镇魁县政府地方武装,多次袭击米山日伪据点,缴枪若干支;配合高平县政府警察武装对高平城以西我地方武装多次袭击,时有打死我民兵现象。晋城行动组袭击城关日伪碉堡,打死日伪两人;配合晋城县政府地方武装,多次打击我地方武装和民兵。修武行动组活动于焦作日伪占领区,曾杀死日军翻译官一名,并杀死修武汉奸多名,迫使焦作日伪警备队交出枪支20余支,并杀死其队长一名。上述各县行动组的活动,都受过军统局的现金奖励。冀鲁豫行动队在河南林县俘虏日本北支派遣军做孙殿英投敌工作的日军中佐一名,由站部转送西安,又被西安转送重庆,参加了日本的反战同盟。

上述资料表明:由于当时国内全民抗战的大势所决定,军统晋东南站既公开进行合法的抗日斗争,也秘密进行非法的反共活动。

这里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军统既是一个专门反共反人民的特务组织,为什么他们也进行抗日斗争,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从表面看他们参加抗日较进行反共的次数还要多呢?其基本原因在于,我党我军为了顾全大局,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既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国共两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彻底破裂。1940年5月,双方正在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朱总司令又在赴重庆谈判时,从武乡出发,专经陵川,到达洛阳,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达成了在太南停战和划界的协议(见陵川文史资料第一辑《朱总司令过陵川》),促使国共合作的局面可以继续维持,太南地区也因之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是我党根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同国民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结果。这样也势必使军统晋东南站的反共活动,大大受到了客观条件的约束和限制。加之我党一贯依靠人民群众,到处布下了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对国民党特务活动经常严加防范,使军统分子不仅不敢冒犯解放区,就连到游击区活动也寸步难行。笔者认为,这些理由就是对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